

古典共和传统中的公民教育及其启示

陈文娟

[摘要]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公民教育，从教育目标上讲是一种旨在培养良善公民的德性教育。从实施途径来讲，包括公共教育和家庭教育两种模式。在当今社会，古典共和传统的公民教育对于反思西方现代所谓“民主教育”之弊端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共和主义；公民教育；德性教育；民主教育

[作者简介]陈文娟，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原形包括：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古罗马的共和国及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共和国等。^①其主要理论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古代思想家，以及追慕古典传统的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等近代思想家。公民美德与混合政体是古典共和主义最为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对公民教育的重视则可以视为它区别于其他政治思想传统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而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的公民教育构想，还是古代共和国中的公民教育实践，都对西方的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教育目标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在古典共和传统中，“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教育应当着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等问题。这其间的古今之别是非常明显的：西方现代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体系虽然不排斥对公民基本美德的培养，但由于其单薄的公民美德观（表现为所谓的“civility”），这方面的内容与人文博雅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相比是次要的，也是富有争议的；而在古代世界，公民德性（civic virtue）教育则构成了教育最基本的内容。我们知道，自公元前5世纪由普罗塔戈拉和高尔吉亚所肇始的智者运动以来，古典世界出现了两种教育理论：一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教育学，一是以伊索克拉底——西塞罗——昆体良为一脉的修辞术教育。但无论是哪种教育理论，都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德性教育。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借雅典客人之口探讨了古典理想中教育（paideia）的本质，他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教育：一种是诸如做生意、造船等技巧训练的教育；一种是“从童年开始就引人追求美德，令人渴望成为完善公民的训练”。前者“与理智和正义没有任何关系，目的在于获得财富或使身体健壮”；后者的目的是“让人知道什么是对正义的服从，怎样以

^①本文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民主制的雅典、寡头制的斯巴达及罗马共和国。

正义使人服从”，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古典世界的教育、伦理和政治存在着内在相通性和一致性：“好人”就是有德性的人，只有好人才能成为好公民，而且教育是使人变成最优秀的绝佳捷径，因此，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事情。^[1]

古希腊另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伊索克拉底在其教育宣言《驳智术师》中也重申了古典共和传统中的“德性教育”主题，他指出，学习政治的智慧与言辞即修辞术，对践行德性最有帮助，是一切知识当中最高贵的，要求学生长期努力和辛勤付出，但回报是得到知识和实践智慧，而这些对公共德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2]“学习政治的智慧与言辞”这一理念是伊索克拉底全部教学实践的缩影。和柏拉图一样，伊索克拉底创办了学园，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演说家从他的学校走出，他的教育目标是教导公民在他们自身的私人生活与公共事务中取得成功。他用一生的教育实践向我们证明，修辞术不仅是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工具，而且也是传递高尚道德的手段。

在《演说家的教育》的前言中，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培养的演说家是完美的演说家，他只能是一个善人，因此，我们要求他不仅有非凡的演说能力，而且拥有一切道德德性。”这个拥有一切道德德性的演说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一个适合处理公私事务的人，一个能够以其建议指引城邦、以其立法奠定城邦、以其洞见改革城邦的人”^[3]。在昆体良看来，一个在法庭上为正义辩护、指导人们趋善避恶的演说家，首先应具有崇高的品德，一个没有良好德行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演说家；因此，昆体良反复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崇高德性而又精于雄辩的人，崇高的德性甚至比广博的知识和雄辩的才能更重要。

古典教育的核心即德性教育，就是要把最优良的事物如节制、勇敢、正义等美德植入公民的灵魂。既然只有德性教育或者说公民美德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那么通过哪些方式来教化公民，使他们拥有优异和卓越的德性呢？

在《普罗塔戈拉》的著名段落中，柏拉图从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两个方面清楚地表达了实现德性教育的途径。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进行教育和训诫，通过自己的言行告诉他“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美、那个丑，这样虔敬、那样不虔敬，做这些、不要做那些”。柏拉图认为教育需要系统的训练，教师要教授一门门的技艺，比如，要进行诗教，要强迫孩子诵读并背诵诗作，因为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警言，还有不少古代好男子们的外传、颂赋和赞歌，可激发孩子们去摹仿他们的德性；还要进行乐教强迫孩子们的灵魂熟悉节律以及和音，养成好的品性；还要进行体育教育以期有更好的身体可以为有益的思想效力；最后，强迫孩子服从城邦的法律，按照贤明的古代立法者发明的立法来统治和被统治，谁要

是特立独行，城邦就进行惩罚。“一个男子的德性——如果有这种东西，它必然便是所有人必须分有的东西……‘如果有这东西’就必然得训导和惩罚没有这‘德性’的人，无论小孩、男子抑或女人，直到通过惩罚使他变得更好。”^[4]“强迫”、“惩罚”这样的字眼反复出现，说明了其在教育中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人的灵魂不会自觉向善，在从初级灵魂向高级灵魂上升的过程中，需要教育的训导和强制。在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时期的教育实践中，诗教、乐教和体育（军事教育）都是公民进行德性教育的重要方式。在驯化自然情感、发展道德性、实现更高的理智德性方面，诗教功不可没。在学校中，诗人的作品是学习的主要教材，背诵荷马诗篇和赫西俄德诗篇是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公元前七世纪，阿提卡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诗描绘了理想的斯巴达男性的英勇形象，“他站在阵列的第一线，严守阵地丝毫不动摇，他深知这是为了城邦和她的所有子民，”从而激发士兵战斗激情；在历史史诗《布匿战纪》中，奈维乌斯用诗歌表达罗马军队的牺牲精神，“他们宁可让自己就地丧失性命，也不愿带着耻辱回到同伴中间”。^[5]诗歌所展示的英雄人物的勇敢、力量、正义等，使人们的情感得到陶冶、净化、疏泄，唤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劝善戒恶。

在通向美德的教育中，乐教也是古典教育尤其是童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年幼的灵魂难以接受严肃事物，而音乐却能以最愉悦和最轻松的方式，通过唱词的德性内容和特有的和谐节律，陶铸灵魂之卓越。通过音乐训练，孩童学会自我控制，养成良好习惯，懂得遵守法律。在斯巴达，教会年轻人诵唱国家法律和英雄赞歌，激发他们竭力仿效老一辈英雄去创造新业绩，是最富教育意义的事情。乐教还是培养斯巴达战士的主要手段，歌词内容庄严奋励，或是赞扬英勇献身的人，或是谴责贪生怕死之徒，曲调旋律朴素强劲、坚定简单，有利于培养战士勇敢、服从、遵守纪律、自制等德性。^[6]在古希腊，合唱表演是城邦教育的核心和开端，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开始。《法律篇》中雅典客人说，一个人“没有受到教育”是指一个没有受到合唱训练的人，这个说法尽管夸张，但在柏拉图时期的马格内西亚城邦的典型公民，一年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参与到合唱与舞蹈中却是平常不过的事情。^[7]在古希腊“大酒神节”，悲剧（肃剧）演出对初具政治权利的男青年（18~20岁）的教化作用不容小觑，仅从以下两点便可知晓：一是肃剧歌队往往由这个年龄段的男青年组成，歌队的舞蹈和歌唱训练带有准军事化的严厉；二是酒神节观众席的中心位置也是留给年轻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接受教育，以便未来更好地参与政治。^[8]

公民德性教育的内容还包括体育及军事教育。在古典时代，战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压倒性影响使得体育训练决定性地与军事教育联系在一起。例如，雅典有军事性的公民教育机制，即“埃菲比亚”制度。它规定雅典青年最终取得正式公民权必须参加为期两年的军事教

育，以培养青年的作战技能以及对法律和权威的权威。^[9]在斯巴达，由于战争危险加剧，国家实施军事色彩浓厚的国家教育制度，即“阿高盖”制度。严格的身体训练、独特的生存训练和残酷并饱受争议的特殊训练等教育内容，不仅旨在培养斯巴达公民的军事技能，而且旨在培养崇尚荣誉、吃苦耐劳、节制忍耐、爱国守法等不屈不挠的公民美德和特殊道德品性，最终将斯巴达人培养成为优秀战士。^[10]

由上观之，古典公民教育旨在培养优良的公民，通过诗教、乐教、体育及军事教育教学和活动，让公民积极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善业，培养城邦未来公民的品质和技能，公民在投身于城邦的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善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向善本性。因此，在古典教育传统中，好公民和好人是一致的，公民教育与公民德性教育也是一致的。

二、实施途径

在古典时期，公民教育的权威首先属于国家，由国家来实施统一的公共教育。城邦的利益和安全最为重要，零散的、碎片的、缺乏规制的教育，不能让公民作为一个整体有意识地承担起公民责任，也无法为城邦安全提供必要的基础。因此，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为了保全政体，“教育应该由城邦来管理，由国家来规制”，让“公民的情操”经过“习俗和教化（教育）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培养公民对共同体的爱、对公共利益的无私奉献以及对个人利益的自我弃绝。^[11]

教育分为两类：公众的和特殊的，或者说共同的和家庭的，分别针对公民与个体。在《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中，卢梭认为，既然国家体制使所有人一律平等，所有人都必须在一起以相同的方式接受公共教育。这种教育囊括每个人生活的全部，包括可能属于个人娱乐的部分，如游戏就应该是公共的，不应允许他们各自单独随心所欲地玩耍，而是所有人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起进行。^[12]他指出，共和传统中的公民教育不是按照“人之所是”来各尽其才，而是按照“社会之所需”来教化育人，公民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使他们成为所需要成为的样子”^[13]。正如家庭教育对于父权制下的男性家长具有重要性一样，公共教育的结果对于国家也尤其重要，实行公共教育的克里特人、拉栖第蒙人和古波斯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创造了辉煌，因此，一个明智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大力实施公共教育。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控制 and 实施公民教育，通过立法规定教育的“课目、顺序和形式”^[14]。共和教育制度要求所有人自孩提时代起都应一视同仁地接受公共教育，以便从小培养公共精神和公共情感。

由此可见，在古典共和传统中，人的价值不是通过其自身来证成的，而是通过与国家、与整体的关系来证成的。评判公民教育制度的成败在于它是否培养了国家所想要他成为的那

种人。共和国要成为一个凝心聚力而不是一盘散沙的道德共同体，意味着个体要弃绝孤独自为的自然人状态，成为相互联系的公民人。以国家的视角来看，个体融入、化入共和体制从而形成整体优势和道德优势，因此，公共教育就是要“剥夺人的绝对存在，以便使之成为相对存在，把‘我’转移到共同的整体中去”，于是，“我”就不再把自己看作单单一个，而是整体的一部分，仅仅感觉自己在大家之中。”^[15]

在斯巴达，吕库古的立法规定，由国家对孩童进行有组织、有体系、严格的公共教育，人人都过着规定的生活，从事规定的公共事务，时刻考虑到自己整个地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个人。据柏拉图说，伯里克利给亚基比德派了个叫佐皮罗斯的普通奴隶当家庭教师。吕库古是不愿意将斯巴达的孩子交给买来的或雇来的家庭教师去管教的，法律也不准许父亲随心所欲地抚养和训练自己的儿子。^[16]在儿童时期，男孩子们被父亲带到称之为“菲狄提亚”（phiditia）的公共食堂，接受斯巴达生活方式的初步训练，在那里他们倾听政治辩论，领受有益的教育典范。^[17]孩子到7岁，就全部由国家收养，编入连队，在连队里遵从划一的纪律，接受划一的训练，一道游戏和学习。在连队，国家不仅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讲授国家的政治法律、风俗习惯、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训练儿童成为国家未来的护卫者和统治者；还进行严酷的准军事化训练，训练他们成长为一个忍耐力强、勇敢刚强、能征善战的勇士。年满20岁，就可以结婚，但仍然要住在军营，直到30岁才能成为国家的正式公民，在30岁之前，都是由国家对青少年进行公共教育。^[18]

色诺芬依据古希腊人的理想所拟构的居鲁士时代的波斯教育制度，要求所有人自孩提时代起都应一视同仁地接受公共教育，以便从小培养公共精神和公共情感。在孩提时代，通过讼案了解公平和公正，通过饮食学会克制自我欲望和服从长者权威，学习投掷标枪和搭弓射箭这样的体育和军事技能；在青年时期，学习战时追击的技艺，并为了国家利益随时准备跟随统帅；在成年时期，公民教育继续培养公民具有强健体魄和坚韧意志，并培养听命于统帅、为国效力的忠诚品质，从而更好地履行作为共和公民的职责。^[19]

国家控制公共教育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而在古典时期希腊的其他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早期，家庭教育却更具代表性。学校教育在罗马共和国晚期才逐渐形成，在共和时期早期罗马还没有出现学校，因此大部分教育活动主要是通过家庭教育来完成的。在罗马家庭中，教育的权威属于父亲，父亲是孩子们的统帅，国家并不干涉他的自由。罗马的政制反对“任何固定的，或是法律规定的，或是由国家设定的，或是对所有的人同一的”公共教育体系，^[20]主要由父母或教仆对孩童进行教育，来培养优良的品性和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罗马是一个从农业小邦发展起来的国家，通过征战和对外扩张逐渐成为罗马帝国，因此，

对男性孩童而言，家庭教育主要是把他培养成共和国未来的好农夫和好战士；而对女性孩童而言，主要是培养其成为好主妇，即合格的罗马公民的好妻子。一般而言，1~7岁的子女都由母亲进行教育，7岁之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分工负责，母亲更多承担对女孩的教育，父亲更多承担对男孩的教育。

在共和国早期的和平时期，公民首先要致力于改变早期罗马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生产力，积累财富，保证衣食无忧，并准备国家战时所需物资；在战争时期，好农夫变成好战士，拿起武器，勇敢地捍卫国家的安全。据李维记载，公元前458年，罗马遭到外敌埃魁人的进犯，执政官卢基乌斯·弥努基乌斯·钦钦纳图斯率领的军队被敌人包围，危难时刻，元老院决定任命昆克提乌斯为独裁官，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当元老院派使节们通知他统兵迎敌时，他正在自己的土地上干农活。当听到元老院的委任后，立刻临危受命，拭去灰尘和汗水，换上长袍，走马上任，领兵作战，并取得胜利。凯旋回城后，昆克提乌斯在第十六天就交卸了授权六个月的独裁权，解甲归田。^[21]

李维笔下的昆克提乌斯是“好农夫”和“好战士”的典范，老伽图的子女教育法正是仿效这一典范进行的。普鲁塔克曾记载，老伽图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尽管事务繁忙，但他仍然亲自教授孩子。“不但成为孩子的启蒙教师，还是法律课的家庭教师和体育教练。他不仅教儿子投铁饼、披甲戴盔去骑马，还教他打拳，经受寒暑锻炼，在台伯河追波逐浪尽情泳渡。他亲手用正体字写成《罗马史》，这样他的儿子不必出门就能熟悉本国古代的传统。”^[22]小斯基皮奥也曾说，尽管“由于父的用心，曾受过广泛的教育，从小便充满强烈的求知欲望，不过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家庭教训，而不是依靠书本获得知识的罗马人”^[23]。

家庭教育对女性的教育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经济基础、社会阶层、家庭背景和父母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差别，罗马女性的家庭教育一般仅限于贵族家庭，并且母亲承担着主要的教育任务。在对女性的教育中，品德教育是第一位的。“道德始终是占据首要地位的因素，道德的形成是教育的最高目的，道德远比知识重要，道德既是知识的目的，又是获取正确知识的必要条件。”^[24]罗马优秀女性形象是一个具有强烈家庭责任感的主妇，母亲会用女性楷模来教育女儿。母亲还要教女孩如何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的持家生活技能，如生火、汲水、准备食物、做饭、缝制、纺纱和制作衣服等，据记载，雷必达家中的纺织机日夜不停地织布，他的妻子还亲自进行纺织。蒙森曾说，“按罗马人的观念，纺织之于女子，如同耕耘之于男子。”^[25]此外，女性也学习读、写、算等文化知识，只不过与道德教育和实用技能教育相比，识字和阅读的知识性教育相对不那么重要。最终，通过家庭教育要培养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忠贞孝顺的合格罗马公民的妻子。

概而论之，在教育权威的归属及其实施方式上，古典公民教育存在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教育权威属于国家的公共教育模式；一种是古罗马共和国早期为代表的、教育权威属于家长的家庭教育模式。

三、启示与借鉴

尽管西方现代公民教育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是，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现代西方公民教育把培养公民的正义感和权利意识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忽略了德性教育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正义被视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26]因此，现代公民教育强调在法律程序下保障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以财产为核心的公民权利的实际享有和真正实现，注重对公民权利意识及其捍卫自身权利的行动能力的培养，但它忽略了德性教育在唤醒人本身的优异和卓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权利优先于善、优先于社会责任感或公共利益现代观念影响下，西方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不仅忽略人的灵魂的提高和升华，而且忽略公共义务、共同体认同感、爱国主义的培养。最终，在现代公民教育的框架下，无法产生伟大的心灵，只能生产没有精神和远见的专家；无法造就积极的公民，只能输出只读报纸体育版和娱乐版的缺乏公共精神、没有任何智识和不进行任何道德努力的“市民”。

第二，现代西方公民教育要么基于权利理论把教育的权威置于父母，要么基于中立性原则让职业教育家主导教育，但这两种方式都忽略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自由主义之父”洛克认为，父母天然地对孩子具有深厚情感，必然是孩子利益的最好保护者，养育和教育孩子是他们不容推卸的责任，因此，任谁（包括国家）也不能解除父母教育孩子的责任；^[27]密尔则为一种更自由的教育辩护，他反对由国家来主导和控制教育，认为把教育权威赋予比父母或公共官员更为中立的职业教育家，更有助于实现自由教育目标。^[28]在极端自由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公民的“政治父母”（国家），还是公民的“自然父母”，都不能影响孩子对好生活的选择，国家和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机会，但不能代替孩子选择，应该让孩子自己在最广泛的生活方式中自由地、理性地进行选择，这样才符合教育正义的多元化原则。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忽略了国家、家庭、个体乃至社会都能通过教育来参与塑造社会结构。由于人本性很难自觉服务于公共利益，故国家教育对于自我之善与社会之善、个体美德与社会正义的融合不可或缺；又由于国家的智慧未必超越其公民所具有的智慧程度，国家所追求的善也未必与公民所尊崇的善相吻合，所以还需要家庭、个体自身乃至社会参与其中。因此，任何一种绝对的权威都不必然具有教导孩子过这种而不是那种生活方式的道德优先性，公民教育是一项需要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事业。

参考文献:

- [1]布舒奇.《法义》导论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100.
- [2]古希腊演说辞全集 伊索克拉底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15. 331—338; 葛怀恩. 古罗马的教育: 从西塞罗到昆体良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 34—35.
- [3]葛怀恩. 古罗马的教育: 从西塞罗到昆体良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 152.
- [4]柏拉图四书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77—79.
- [5]王焕生. 古罗马文学史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43.
- [6]李立国. 古代希腊教育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 38.
- [7]布尔高. 柏拉图式城邦中的音乐与教育 [A]. 姜林. 柏拉图与古典乐教 [C].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 13.
- [8]郝兰. 悲剧性过错: 重启《诗学》 [A]. 刘小枫, 陈少明. 诗学解诂 [C].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269.
- [9]吕厚量.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文化 [J]. 世界历史, 2014, (4).
- [10]祝宏俊. 军事教育与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 [J]. 世界历史, 2013, (4).
- [11]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75—407.
- [12][13][14]卢梭. 政治制度论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53—55、153、53.
- [15]卢梭. 爱弥儿 (上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9—10.
- [16][17][18][22]普鲁塔克. 希腊罗马名人传 (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06—107、99—100、116、366.
- [19]色诺芬. 居鲁士的教育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1—50.
- [20][23] 西塞罗文集 (政治学卷)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116、27.
- [21]李维. 自建城以来 (第一至十卷选段)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107—111.
- [24]张斌贤, 褚宏启. 西方教育思想史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4. 163.
- [25]蒙森. 罗马史 (第一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54.
- [26]罗尔斯. 正义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 [27]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M].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37.

[28]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7—118.

The Civic Education of Class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Chen Wenju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goal, the civic education of western class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 is the education of virtue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good citizens; the educational approaches include public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Today, the civic education of class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 is helpful to reflect on the drawbacks of so-called "democratic education" of western modernity.

Key words: republicanism, civic education, education of virtue, democratic education